

烽火桃书

新兵煊



5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小说描写的是抗日战争期间，晋东南历山地区的军民，在党的领导下，粉碎日寇和汉奸的种种破坏阴谋，克服多种困难，创办抗日学校，积极为革命培养人才的故事。作品既有紧张愉快的学校生活的场景，又有与公开和隐蔽的敌人激烈斗争的画面，故事曲折生动。党的地下工作者周林、机智勇敢的学生于戈，以及女学生刘萍等人物，都刻画得比较成功。

目 次

1	远方炮声.....	(1)
2	散学.....	(11)
3	委任状和聘请书.....	(20)
4	“砸了它!”	(30)
5	新学校.....	(37)
6	开学典礼.....	(45)
7	第一课.....	(53)
8	白静入学.....	(61)
9	原来是狗.....	(69)
10	练胆子.....	(74)
11	两个哨兵.....	(78)
12	夜半枪声.....	(86)
13	常松爷爷.....	(99)
14	闯过望云台.....	(107)
15	伏击.....	(116)

16	重建新校.....	(125)
17	阴谋.....	(133)
18	受骗.....	(143)
19	刘萍收到的信.....	(156)
20	出逃.....	(163)
21	深夜来客.....	(170)
22	出狱回校.....	(178)
23	两个鸡蛋.....	(192)
24	参军.....	(200)
25	深夜宣传.....	(213)
26	狂欢之日.....	(224)

1 远方炮声

一九四一年，暮春。日本鬼子的侵略魔爪在继续伸张，祖国的大好河山，不断地被蚕食。

这些天，隐隐约约的炮声不断从远方传来，穿着黄色服装的队伍，老是向南，向南。拉着大炮的骡马，带着太太的军官，全副武装的士兵……就象决了堤的洪水，一直向南涌去。他们身上的枪械，仿佛不是为了抗击日寇的侵略，只有抓伏派款抢东西时才发生效用似的。这些平时还算宽阔的街道、大路，在这些拥挤南逃的士兵脚下，已经显得越来越窄小了。他们象一群飞蝗，被挤出了乡间大道，在那起伏的将要成熟的麦地中间；在那刚刚破土向上长的谷子和玉茭地里漫了过去。禾苗被踩倒了。劳动的人们被赶散了。这些见了鬼子一枪都不敢放的士兵，在这些手无寸铁的人民面前逞起强来。他们的枪弹伴随着远方传来的日本鬼子的炮声，在奔跑着的妇女，孩子、老人的头上呼啸。孩子在哭叫，大人在呼唤。一个老大娘的包袱被抢走了。一个被追逐着的青年妇女，一面没命地跑，一面在喊着“救命呀！救命！”一个在煤窑上驮煤回来的老汉，当他的毛驴被一个小连副抢去给他的

太太骑，便蹲在被推翻的驮子边，搓着两手，抖动着胡子，气得不停地骂：

“畜生！这些畜生！”

中封高级小学的青年老师周林站在自己的窗口前，看着那黄色尘土中向南涌去的人流，脸上的表情在不断地变化着：先是吃惊，接着便是愤怒，最后，“乒”的一声用力把窗户关上，愤愤地说：

“国民党这些败类，只知道夹着尾巴向后跑，一枪不放地向后跑，抓伏派款时的那股凶劲，不知跑到哪里去了！”

他坐回到椅子上，顺手拿起一支铅笔，在一张纸上画着圈圈。那圈圈有圆的，有椭圆的，大圈套着小圈，密密麻麻。那黄色的尘埃，仿佛还在他的脑际荡绕。在这黄色的尘埃及南去的人流中，他好象又看到了中国的现实：汪精卫公开投降了日本，蒋介石和日寇明铺暗盖，口头上抗日的口号喊得震天响，但实际上是在联合日寇对付领导全国人民抗战的共产党。在湖南，他们闹平江惨案；在河南，他们制造确山事件；在河北，张荫梧打八路军；在山东，秦启荣打游击队；在山西，阎锡山又发动了十二月政变，旧军打新军，屠杀共产党人……而在日本侵略者面前，他们就是这样地向后败退，从东北，从华北，从全国的每个战场，一个劲地向后败退。周林清楚的知道，最近一个时期以来，日寇以五万人的兵力，进攻山西南部黄河以北的中条山地区。在这个地区国民党军队是七个军，另在东面高平地区又有四个军，合计二十五万人之多。这些家伙们在这里本以反共为其主要目的，

对抗日向无作战准备，此时便采取避战方针，大踏步地向后退。虽然八路军在这个战役中主动配合国民党打击日寇，但国民党军队还在全线溃败，不到三周时间，失去不少城池，丧失五万余兵力，下余人马，也正在渡过黄河，没命地向后退窜……

周林的思路被开门的声音打断了。他扭回头来，见门口站着一个学生，这学生名叫于戈，是他教的那个班的，今年十四岁，按说，已超过了上高小的年龄，不过，乡间里，孩子们本来上学就晚，在这里，十五、六岁的孩子上高小，并不算稀奇事，已经娶过媳妇还在高小读书的有的是哩！这是因为有些孩子年幼的时候家境太穷，上不起学，到了家境情况稍有好转，才有机会读书；也有的是为了逃避国民党征兵，才到学校读书的，据说学生可以免征。不过，于戈这么大年龄还上高小，既不属于第一种情况，也不是第二个原因。他的家境没有好转，也还不到征兵年龄，只是因为父亲被地主逼死以后，母亲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，决心供出一个念书人来，支撑门面，为屈死的丈夫报仇，所以才硬着头皮，把全家人的生活重担放在自己一个人的肩头，送儿子进了学校。

现在，于戈见老师扭回头来，才说：

“老师，校长要我请你去开校务会。”

“嗯。我就去。”

听过老师的回答，于戈才退出门来，向楼下走去。

学校的会议室，也就是老师们的办公室。这是一间座北

朝南的三间正房，用木板隔了起来。东边一间，高校长作了宿舍，西边两间，作为老师们办公用。房子本来不大，加上老师们每人一张办公桌。就更显得狭小了。说是办公室，可是一看那摆的八张条桌，却象一个小课堂。办公室的布置很简单，中间墙上挂着一张孙中山总理的遗像，左右两边，各有四个楷书大字，左边是“忠孝仁爱”，右边是“礼义廉耻”。

当周林走进会议室的时候，人们已经到齐，于是，他便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坐下，顺手拿起桌子上的半截铅笔，在一张纸上划起了他那没完没了的圈圈。高昌校长身体瘦弱，虽然今年才四十出头，可是看起来却象五十上下的人。他穿着件青布大褂，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，见人们都到齐了，便慢慢站了起来，两手托着桌子边，一字一板地说：

“现在我们开个校务会。这几天，大家都听到了炮声，听说日本鬼子已经到了东五岭，阎锡山早已向日妥协，国军又不分昼夜地向后开，各位看我们学校该怎么办？”

他这人就是这样，讲话不是一句一句地讲，而是每个词都要停顿一下，不管多紧的事，一经过他的嘴，紧张气氛就减了很多。他一个词一个词的把当前的问题提了出来，就又坐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后，静等着老师们发表看法。可是，一个吭气的人也没有。

寂静，可怕的寂静，静得仿佛可以听到每个人的呼吸，听到那偶尔飞进室内的苍蝇的嗡叫。

第三排左边那张桌子后面坐着的，是一个瘦高个子的教

算术的老师。这人有一对小眼睛，那鼻子也许是为了配衬他那细高的身躯，高得有点出奇。他姓李，单名一个“旭”字，是本镇财主兼商人李本斋的大少爷，在潞安府师范学校毕业之后，先在家帮他老子管了一个时期帐，以后就到中封高小任教，听人说，他还到陕西省宜川县的秋林镇受过特务训练，阎锡山在这一块组织“防共保卫团”的时候，他便参加了这个组织，由于他有作特务工作的才能，很受上司的赏识。现在，他见没人开口，便放下了手里翻开的那本学生作业，说：

“是呀！这确实是个问题。日本人来势凶猛，连国军都向后开，我们这些儒家子弟又有何方？”他的话使人感到非常刺耳，很难分清他是在故意卖弄，还是对当前局势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。他干咳了两声。看了看大家，似乎要听一听人们对他的高谈阔论有什么反映。可是，人们好象没有听见似的，于是他又把声音提高了几度：“日本人虽然很凶，我看对我们这些吃粉笔灰的教书匠，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。等他们到了这里，我们可以组织维持，继续上课。听说不少沦陷区也都是这么干的。”

李旭的这番话，周林并不感到意外。对李旭这个人，他还是了解的，不只了解他的过去，也注意了他近来的表现。这个时期以来，李旭就在老师和学生中不断散布投降反共的论调。什么“日本人力量大，武器好，中国不是对手”啦，什么“抗日必亡国”啦，什么“曲线救国”啦，什么“攘外必先安内”啦，等等。不过，在这样公开的会议上放肆地宣扬他那投降主张，还是头一次，所以，不能不予以回击。等

李旭的话刚一落音，他便站起来，接了上去。

“不，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。等鬼子占领了这里，那还能容许我们自由上课吗？是的，有些沦陷区组织了维持，虽然学校还在开办，可那是什么教育？那是在进行奴化教育！读的是日本人编印的课本，还要替他们宣传什么‘同文同种’、‘共存共荣’、‘王道乐土’……这些亡国思想。”

“那，你的高见呢？”李旭得意地插进嘴来，心想：这一“军”一定能把你周林给“将”住的。但，周林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，只是把声音也提高了一些，显得有些激动地说道：

“我们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，他们是有民族气节的，那些主张投降或是已经投降的，只是一小撮民族败类！”周林瞥了李旭一眼，见他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，想争辩，但又说不出话来，于是，周林又接着说道：“我们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，黑了南方有北方，日本鬼子只能暂时占领一些城市和一些较大的镇子。整个山西还在我们手里，我看还不如把学校搬到山区，继续上课。”

两种意见和主张，摆在了人们的面前。人们看看周林，又瞅瞅李旭，仿佛在掂量他们意见的分量。实在说来，不少老师对李旭的投降主张是反对的。周林对时局的分析，他们是赞同的；周林提出把学校搬到山区的大胆设想，他们是敬佩的。可是，学校搬到山区所带来的一系列困难、问题，他们又觉得是难以解决的。他们没有把握，缺乏信心，一个个大

眼瞪小眼，谁也不说话。只有坐在高校长近旁的一位青年女教师，在向周林点头、微笑。这是敬佩，是赞同，是鼓励，又是支持。她名叫梁秋菊，是一位代课老师。

在这七位老师中的另一位女老师，名叫张梅，她瓜子脸，细眼眉，穿着一件浅色小花洋布旗袍，头发剪得很短，张梅今年二十八岁，是县城人，丈夫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连长，因为刻扣士兵粮饷，被士兵打黑枪给打死了。现在她就她带着一个七岁的女孩在这里教书。这人和李旭打得火热，两人一个鼻孔出气，不管什么事，只要李旭一说话，她总要帮腔，学生们背后给她起了个外号，叫“李声虫”，就是李旭的应声虫的意思。人们反映，她和李旭的关系很不正常，为这事，李旭的老婆还来学校闹过一场，李旭把他老婆狠揍了一顿，才算把这场风波平息下去。现在，她见没人吭气，便说：

“把学校搬到山里去，那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呀！我们毕竟是学校，不是逃难的难民。我看李老师的想法还是有他的道理的。日本人也不一定就住到我们学校，他们检查的时候，我们应付一下，过后，再作我们自己的教育。”

“妙哉！妙哉！”李旭高兴得拍案叫绝：“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，张老师算说到点子上了。汪精卫先生说的‘曲线救国’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得意的用手在空中划了半个圆圈。

“‘曲线’！‘曲线’！日本鬼子已经占了大半个中国，眼看连这个小小的中封锁也快要‘曲’进去了，还在‘曲线’！”周林见李旭那样得意，也针锋相对，毫不示

弱：“这不是什么‘曲线’，‘直线’，这汪精卫的政策是百分之百的卖国投降！”

李旭没有防到周林会这么直去直来，一时不知怎样回答。他象一只斗败了的公鸡，只是呆呆地张着嘴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张梅也呆了，一时也给李旭帮不上腔。那穿着大褂的章老师，戴着眼镜的朱老师，还有那代课老师梁秋菊，虽然都支持周老师的看法，但见这两个人针尖对麦芒地顶起来，谁也不敢插嘴，一个个把眼光集中在高校长的脸上，仿佛要在他们这位尊敬的校长的脸上找到答案似的。可就在这时，李旭好象缓过了气来，象忽然抓住了什么把柄，冲着周林大声叫道：

“姓周的，你说谁投降？”

李旭这么大声一叫嚷，周林反而冷静下来了：

“你嚷嚷什么？谁抗日，谁妥协，谁投降，人民大众自有公论。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，这也是有目共睹的。有些人，口里抗日的口号喊得震天响，可是和日本鬼子眉来眼去，明铺暗盖，见了日本鬼一枪不放地向后跑，从东北跑到华北，从华北跑到中原，再从中原跑到西南，把大好河山双手让给日寇，这不是事实吗？不信，请看外面。”周林说着，顺手推开身边临街的窗户。外面的大道上，南逃的士兵所卷起的黄色尘埃，还在不停地翻滚。镇子上，被这些南逃的士兵抢劫一空，到处是骡马粪，烂谷草，破布烂套，破盆烂锅。黄风卷着鸡毛、纸片在空中飞舞。

李旭气得脸红一阵，白一阵，嘴唇直打哆嗦，就是说不出话来。

梁秋菊回头看了看周老师。她感到周老师的话有理有据，说出了她要说而又不知怎样说的话，心里有着说不出的痛快。

高校长一直在默默地吸着旱烟，听着两位老师的争辩，思考着学校的命运和前途，直到现在，他才觉得自己不说话了不行了，于是，磕去了烟灰，说：

“国难当头，事情慢慢商量，不要伤了和气。我说说我的看法。”他好象是在表示自己的决心，把烟锅在桌子边连若狠狠磕了几下：

“要说维持，我不干！虽然我们手里没有枪，没有炮，但我们是中国人，是黄帝的子孙，总还应该有点中国人的骨气，不能在外寇面前低三下四。我宁愿不当校长，不办学校，也不组织什么维持会，也不能给我们中国的儿童灌输亡国思想。”他看了看周林，又看了看每位老师，把烟袋轻轻地放到桌上，“周老师的心情是好的，但我们的学校总归还是学校，搬到山区去有困难呀！没有教室，没有黑板，没有课桌，没有必要的教学器材，学主们的生活又怎么办？”

高校长在提着一个又一个的困难，并连连摇着头。周林放下手里的铅笔，说：

“高校长说得很对，我们是中国人，要活得有骨气，绝不能受日本鬼子的控制。”他看着高校长，把说话的声音又放低了一些，“困难，当然会有。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，怎

么会没有困难呢？鲁迅先生说得好，其实地上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困难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办法是人想出来的，我们不愿做亡国奴的儿童，山里还有抗日的民众，怕啥！”

“周老师，你这股子热情很可贵，可咱们是个近两百人的学校，谈何容易啊！”高校长看了看每位老师，做出了最后的决定：“眼下鬼子还没有进镇，我们照常上课，鬼子真要来了，就暂时散学。”

“散学!?”有几个老师同时惊讶地问。他们一个个都看着校长，好象在判断他刚才说的那句话的真实程度。高校长摊开两手，无可奈何地说：

“是散学。事到如今，也只有走这一步棋了。”

2 散 学

远方的炮声越来越近了。

一大早，随着低沉的歌声，于戈从一条小胡同里跑出来：

……

山西人人忙，
富人搬家忙，
穷人心慌慌，
军官扔部属，
士兵扔大枪……

南逃的士兵已经快过完了，最后几个大兵象穿了兔子鞋似的，倒拖着枪，跑得飞快。军官太太的哭喊混合着镇子上的鸡鸣狗叫，使人心慌意乱，整个镇子被弄得乌烟瘴气。接着，便听到远处传来的机关枪声。

于戈慌慌忙忙跑进学校。这阵子，同学们也是非常忙乱。桌椅的磕碰声，加上同学们你喊我叫的声音，把这前后

两个四合大院闹得象开了锅。住校的同学在捆行李，没有住校的在收拾笔墨纸砚和课本，只听杨胜在敞着嗓子乱喊：

“砚台，谁拿我的砚台啦？”

“哎呀！我说杨胜，你怎么骑着驴找驴，你手里拿的不是砚台是啥？”说这话的是个女孩子，今年十三岁，穿着一件蓝色的旗袍，短短的头发显得很精神。她名叫刘萍，家就在镇上，和于戈的院子只隔一条胡同。于戈过去问刘萍：

“你们这是干啥？”

“散学啦！有几个老师已经回家啦！”

“哪几个老师？”

“李老师和张老师。”

“周老师呢？”

“还在。校长也没有走，还有章老师和朱老师。”

于戈三步并做两步跑进自己的教室，用个小包袱皮把他那儿本课本和毛笔砚台一包，便拿着走出来，向周老师的宿舍跑去。一进门，见周老师正在把一些书往一个大柳条包里装，便着急地问：

“老师，你也走吗？”

“我往哪走呀？”说着，他扭回头来，对着自己的学生微微一笑。

是呀！周林往哪儿走呢？这个学校的老师，大都是当地人，唯有他一个家在外省。他是北平一个修鞋匠的儿子，还是在他九岁的时候，多病的母亲便离开了人间。父亲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。老汉用他那双勤劳的手挣下的钱，供

儿子读书，满望把儿子养大成人，有个职业，也使自己的晚年有个依靠。可是，事与愿违，儿子还没有上完师范，就来了个“七七”事变，书是没法再读下去了，于是，他便含着眼泪，把自己唯一的亲人送上了征途。就这样，周林和一些京津流亡学生一起，来到了山西。那时，我党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组成抗日统一战线，经过各种工作，对阎锡山进行了争取和团结，并帮助他组织了一批新的抗日武装力量——山西新军，还帮他改组了山西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“牺牲救国同盟会”（简称“牺盟会”）。“牺盟会”吸收了大量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。周林到山西后，和几个同学先是参加了“牺盟会”，进行救亡宣传，后来又进了新军的青年抗敌决死纵队。在决死队里，经他的教导员黄立雄同志的介绍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八路军东渡黄河抗日之后，他和黄立雄同志又一块调到了八路军，黄立雄同志在十七团当副政委，他就在团政治处当宣传股长。在一次对抗日作战中，他负了伤，部队到处流动，就把他留到中封镇于戈家里养伤。伤好后，身体虚弱，一时很难跟随部队东征西战，加之为了开辟历山地区工作，建立抗日民主政府，便把他和黄立雄同志一块留到了历山。一九三九年十二月，蒋阎合谋，企图消灭新军及我党的地方组织，在晋西地区集中了六个军的兵力向新军进攻，被新军的反击所粉碎。与此同时，阎锡山的爪牙孙楚所指挥的部队，在晋东南地区，摧毁阳城、晋城、沁水一带的抗日民主政府和人民抗日团体，屠杀大量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。那时，他如果不是于戈妈的掩护，怕也得遭到